

# 登国年间北魏与契丹史事探赜

任爱君

北魏登国年间(公元386年—395年),对于契丹人的历史来说,是特别值得一书的时刻,从这个时候起,契丹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群体开始活跃于中国北方草原。因此,笔者试对这一时期内北魏、契丹之间的史事,扬隐发微,作些探讨,倘有助于对古代游牧民族创造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则属幸甚。

## 一、登国年间双方的历史真实及其关系

公元386年,曾雄踞北方草原的鲜卑代政权的后裔拓跋珪,乘控制中原的前秦政权崩溃之际,纠合旧部,重新占据代国旧地,并建号魏王;这是北魏王朝的开端,“登国”是其第一个年号。案诸《魏书》可知:登国年间(公元386年—395年)是拓跋魏政权的奠基时代。开国之初,拓跋珪外倚后燕,内服叛降,消灭了刘显、窟咄等异己集团,很快确立和稳定了他在阴山以南草原地带的统治秩序。然后,将军事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登国二年十月,幸濡源。十一月,幸赤城。十二月,巡守于松漠。①拓跋珪这样做是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的。史载,其先祖平文皇帝郁律时期,已是“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②史言虽虚,但鲜卑宇文、慕容诸部曾慑服或主动结好于拓跋部,却是真实的。至拓跋珪的祖父什翼犍时期,更是“东自涉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③事实上已是雄视北方草原的霸主。因此,拓跋珪东巡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规度、恢复父祖时代创立的强大的行国规模。

此时,燕山迤南、辽河东西,早已为实力雄强于拓跋珪的后燕慕容垂集团所占据。而燕山以北,也已非魏属,这里自古以来号称“松漠”,其地南阻燕山、北抵兴安岭、西迄蒙古高原的东南缘,是典型的山地环境,这里自古以来溪涧密布、松林茂盛,是一处天然的宜牧宜农场所。从四世纪中叶起,生活于此的游牧民族,是曾被后赵石勒所倚重的鲜卑“白部”——宇文部的余众。这里散布有地豆于、库莫奚、契丹等部落,其中,契丹与库莫奚以“世同部落”的生活方式,已在这里繁衍,滋盛近四十年,成为这一地域内真正的主人。因此,拓跋珪于登国二年冬巡视“松漠”之后,便将契丹与库莫奚拟定为实施军事攻击的主要目标。

据《魏书·太祖纪》:登国三年二月,帝东巡。四月幸东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洛水。班赏将士各有差。秋七月庚申,库莫奚部帅鸠集遗散,夜犯行宫。纵骑扑讨,尽杀之。其月,帝还赤城。”从以上记载史事的文义来看,北魏似乎已将库莫奚等松漠诸部破灭。然而,《魏书》卷100,契

丹、库莫奚诸传俱言：自此以后，契丹与库莫奚遂相“分背”，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十数年间形成了相互独立、同时并存的二个民族群体，且频犯魏边，成为魏朝的边患。

因此，登国三年战争的发生，可视为拓跋鲜卑政权与契丹、库莫奚等松漠诸部之间建立了各方面往来关系的开端。史载，讨破库莫奚后，拓跋珪曾对其臣下说：“此群狄诸种，不识德义，互相侵盗，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窃狗盗，何足为患。今中州大乱，吾先平之，然后张其威怀，则无所不服矣。”<sup>④</sup>从种种迹象来看，《魏书》所记登国三年拓跋珪大捷于松漠诸部的史事，是值得推敲的。拓跋珪本为经略、控制这一地区而来，却又匆匆归去，从此放弃了夺取这一地域的打算，表明此事之中有其一定的历史余韵。因而，奠定了长期的北魏与松漠诸部的邻属关系。

综如上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登国三年是契丹、库莫奚这些宇文余部以独立的民族整体的形式，出现于史书记载的开始；第二、史实证明了这时的契丹、库莫奚诸部已非孱弱的“宇文逸众”，而是一支比较强大的草原部族。《魏书》所载拓跋珪于登国三年取得松漠大捷的历史余韵，还充分的体现于从公元四世纪九十年代起至五世纪初，雄踞松漠的契丹、库莫奚与后燕、北燕之间长期军事对抗的形势，史载，契丹、库莫奚频犯后燕边地，成为后燕末年的一大边患，甚至后燕之主也惧其强大而不敢逆其锋。从登国三年（公元388年）至后燕末，时间仅隔数年，而契丹、库莫奚的力量恢复得一至如斯，令人不得不对史书所云：登国三年松漠诸部的“惨败”而设疑。因此，笔者认为登国三年北魏政权与契丹、库莫奚之间的历史真象，应当是奠定了契丹等松漠诸部与中原王朝之间从此密切交往的基础。从此之后，控制了中原地区的北魏拓跋氏政权，遂称与其密切来往的松漠诸部为“契丹国”、“库莫奚国”等，<sup>⑤</sup>这是双方以互相独立的形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往来的标志。拓跋魏政权从此走向了封建化的轨道；而契丹、库莫奚诸部遂成为中国北方草原的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

## 二、登国年间双方的往来交通

据《魏书》“太祖纪”、“库莫奚传”记载，登国三年二月，拓跋珪开始东巡，四月至东赤城，五月北征库莫奚，六月破库莫奚于弱洛水（今赤峰市西拉沐沦河）南，渡河而北，七月库莫奚等袭营，拓跋珪再破之，遂还赤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推断：若赤城与东赤城为同一地域或地域相邻的两地，那么，拓跋珪进讨松漠诸部的往来军路线应当是一致的。但是，重要的是，这条路线有如下几点尚需补充，第一、拓跋珪率军自东赤城进入松漠的路线；第二、此行所历若干地域是今何地；这些是清晰瞭解登国三年拓跋珪进军路线的关键。

拓跋珪是恢复拓跋代政权、建立北魏王朝的创始人，被其后代称为：太祖道武皇帝。据《魏书·太祖纪》记载：登国三年以前，拓跋珪先后亲莅松漠地区二次，先是，登国二年八月，平定了诸异已势力之后，遂于十月幸濡源，经赤城，巡狩于松漠，十二月回到了阴山北面的行宫——牛川。这是拓跋珪第一次至松漠地区。接着，登国三年二月，拓跋珪再度东巡，经东赤城，进入松漠，击库莫奚等松漠诸部于弱洛水南。

案：松漠，是古史中的地域名词，辽代时又称为“平地松林”或“千里松林”，据

日本人白鸟库吉考证：辽代的“千里松林”，指西起今河北省围场县，北至西拉沐沦河以北的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等诸旗县，东缘可至今哲里木盟开鲁县一带，其南缘约到今老哈河上游的英金河沿岸，<sup>⑥</sup>这是一片相当广袤的地域，西拉沐沦河流域及其以北的赤峰市诸旗县，是当时这里的腹地。因为这里草木茂盛、水源方便，所以历代以来深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倚重。北魏时期这里的大体范围绝不会与辽代相去太远，这也是拓跋珪急于经略此处诸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濡源，北魏时期称今河北省境内的滦水为濡水，因此，濡源也无疑是指滦水之源了，但濡源在哪里，史料匮乏，已难以确论，尤其是北魏史书中的濡源更是令人思考的问题：因为，滦水上游有许多较大的支流，所以滦水源也起码不仅是一个，滦水上游最大的支流闪电河，位处于最西端，发源于今河北省沽源县附近，而滦河东岸的支流均发源于今河北省围场县的北部，这里已经是古代松漠地域的西缘了。所以，王仲荦先生在《北周地理志》一书中，<sup>⑦</sup>遂指今河北省沽源县一带为北魏时期的濡源城；然而，濡水之源，既如上述；又，今河北省之沽源附近虽是滦河的支流闪电河的发源处，但是此地既称沽源，当是以古代称发源于这里的白河为沽河而得名。因此，濡源之称，当系指今滦水上游水网密布、河道滥觞的地方，可以方为以今内蒙古锡盟多伦县一带为中心的水网、沼泽地区。

赤城，据《魏书》“帝纪”“地形志”，王先生考证今河北赤城南二里山上，曾是北魏赤城镇所在。东赤城是位于赤城镇以东，亦属北魏御夷镇所辖赤城镇之地。

这样看来，拓跋珪于登国三年之前两至松漠地区的路线似乎不同。搜检《魏书》诸帝纪，可以发现：凡言东巡松漠地区，多自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附近）历北魏平城地区径入赤城镇；凡言北巡诸部时，多自阴山北面的行宫所在地牛川（即锡拉沐沦河，原四子王旗境内），或继续北进，或东南行至濡源，南入赤城，遂还云中（或平城）。但比较的来说，拓跋珪在其登国三年以前，无论是东巡，还是北幸，既入松漠地区，便须历赤城镇境而入，可见，北魏初期，赤城镇几乎已是此期进入松漠的必经之路。而濡源地区，其地位则相应的显得次要了。事实上，今内蒙古锡盟多伦县一带（即北魏之濡源），自古以来便是阴山南北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建立各种往来关系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多伦一带进入西拉沐沦河流域以北有二途可行，南路自多伦东行，从今阴河与西路嘎河之间，进入赤峰市郊区境内，转而北行，历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可直入西拉沐沦以北；北路自多伦东北行，直接进入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可以自西拉沐沦河源头处北至达里湖（今称达来诺尔），或继续东北行，沿西拉沐沦的二大源流之一，今百岔河流域下行，渡西拉沐沦而北。案，登国三年拓跋珪自东赤城进攻松漠地区的路线，应当是自东赤城地区东北行，进入今河北省围场县境内，并入多伦南道，在西拉沐沦南击破了库莫奚部的部分部众，踰河而北，沿辽代著名的大黑河（今赤峰市北境的查干沐沦河）上行，追击契丹等松漠诸部。<sup>⑧</sup>

那么，登国二年冬，拓跋珪为何舍却濡源这一直路，而南下赤城，曲径进入松漠呢？笔者以为，可作以下两点解释，第一、对于迁徙无定止的游牧民族来说，长途的行军既是为了作战，同时，也是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的重复；行军过程中强调马、畜的必需生存条件，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对人类自身的注重程度，因为，马畜等是游牧民族须臾不可

分离的工具、财产和食粮。因此,无论是对草场的徙逐,还是军事战争的运动,凡是川原宽广、水草繁密的地带,都是游牧民族所喜闻乐见的通途捷径。所以,游牧民族的军事行动,具备了时间的需求和追逐水草的双重性,这就是其所以“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战而能胜的原因。<sup>⑨</sup>故游牧民族的军事行动路线,是不能以直线求之的。第二、拓跋珪即位时,其北部和东北部仍存在柔然、高车诸族的一些部落,史载,登国四年“春正月甲寅,拓跋珪袭高车诸部落,大破之。二月癸巳,至女水,讨叱突隣部,大破之。夏四月,行还赤城”。<sup>⑩</sup>案,叱突隣,为高车诸部之一,地近北魏初期贺兰部,柔然族始祖曾生活于叱突隣部中。其后,北魏曾创立北边六镇,以防遏高车、柔然诸族。由此推断,当时濡源以北的漠南地区也非拓跋之属地。因为,这些外族直接威胁了北魏的东北边防,这也是以后拓跋珪屡次北巡的原因。而登国三年拓跋珪选中了松漠诸部为目标,开始推行了对外的扩张,这是史书记载中的初次对外战争,所以难免没有观念中存在的那种避实击虚的尝试性。因此,登国初年的赤城镇之地遂成为拓跋珪进入松漠的重要路口。

契丹、库莫奚之众,自登国年间以后,与北魏王朝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政治往来关系。先是,松漠诸部以其名马、文皮入贡于北魏,同时,也从北魏获得了大量毛、布制品、食粮等赏赐,这是历代以来中原王朝所谓“怀柔夷狄”的定式,因此,随双方往来关系的日益频繁,遂在北魏安、营诸州之地,开设了密云、和龙等“交市”地点;<sup>⑪</sup>至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契丹在经历了近百年的交往后,其一部因畏柔然族的侵逼,“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糴”;<sup>⑫</sup>太和四年,库莫奚亦以畏地豆于诸部抄掠而“辄入塞内”,“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交易往来,并无疑贰”<sup>⑬</sup>。可见,登国年间以来,迄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年—499年),契丹、库莫奚诸部确曾于北魏达成了密切的邻属关系。正常的通贡,对于契丹等松漠诸部来说,无疑等于它们在同大国北魏进行的商业贸易中取得最大的成功。史载,北魏灵太后当政时,曾有契丹朝贡使三十余人欲还,太后以其俗尚青毡,遂人给二匹,“赏其诚款,余依旧式”<sup>⑭</sup>;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契丹、库莫奚诸部直到北齐时代仍然保持了与北朝政权的朝献关系。这是当时契丹诸族与北朝政权建立的各方面往来关系的完整内容。

### 三、余语

人类社会史证明,凡是有人群的地区,总是要与其他地区的人群建立这样那样的往来关系,当然,这种关系的实行,是要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制约。一个人群在其生活地域内的长期发展而拥有了不同于其它人群的特征,而形成了独立的民族;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总是首先体现在各自创造的社会文化的相互碰撞上,从而建立了一种在形式上有主有次,在内容上是共同奉献的往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置这种体现血缘关系的民族于不顾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作为地域交通关系的诸民族之间的往来,总是有途可寻的。

西辽河流域与阴山南北地区的地域交通关系,早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代已经确立了。闻名于世的中国北方细石器文化分布带,即从辽河流域、燕山南北,经过今河北省北

部、北京市境内，进入阴山南北地区，由此再向西而至新疆等地，甚至还南达今云南省境内。<sup>⑤</sup>田广林认为，发生于人类社会史前时代的这种地域之间的交通关系，处于更新世晚期间冰期的温暖时期。<sup>⑥</sup>而西辽河流域、阴山地区、均处于欧亚大陆腹心区域存在的狭长草原地带的东端；由此而言，中国北方草原在史前时期便存在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当中国历史的发展已进入人类社会的封建时代以后，如果说，燕山迤南、辽河东西已是处于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圈的日益严密的笼罩之下，那么，燕山迤北西辽河流域则基本上是一派戎风胡语的世界，至此，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东西之间的地域交通的责任，也历史的落到了西辽河流域与阴山地区之间的交通线上。史传，东部鲜卑中著名的宇文鲜卑，即是起自阴山而迁入松漠的<sup>⑦</sup>。拓跋鲜卑于登国年间进攻松漠的路线，其所经历的濡源（多伦）古道，就是自古以来，草原地区东西交通的重要路口。虽然，这些地域之内的主人可以更易，然而维系人类之间地域交通的重要路口则不易改变；鲜卑人的时代是如此；契丹人的时代也是如此。辽太祖阿保机天赞三年西征的路线。<sup>⑧</sup>及中原人士胡峴随契丹将领萧翰自幽州还契丹的路线，<sup>⑨</sup>皆应如是。

因此，北魏初期的濡源，成为联系当时的西拉沐沦河流域于阴山地区的咽喉要道。这条自古以来，形成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交通大道，已历史的为沟通、维系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往来做出了贡献。

#### 注释：

①参见《魏书·太祖纪》。

②③详见《魏书·序纪》。

④详见《魏书·库莫奚传》。

⑤详见《魏书》诸帝纪。

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

⑦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本。

⑧参见田广林《说契丹黑山》，本刊1985年第1期。

⑨见《魏书·燕凤传》。

⑩《魏书·太祖纪》。

⑪⑫⑬⑭参见《魏书》卷百，契丹、库莫奚传。

⑮董恩正《略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与考古论集》，1987年，文物出版社。

⑯苏赫、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见本刊1989年第4期。

⑰参见《周书·文帝纪》。

⑱参见《辽史·太祖纪下》。

⑲参见《契丹国志》卷25《胡峴陷北记》。